首先还是对作者毕游的行文做一个技术性的点评。

优点方面，作者充分利用了电子数据库的优势，通过检索、统计，以直观、简易的方式直接根据思想家的传世著作来分析其思想主张，事倍功半；其次，作者发扬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所使用的方法，以现代化的哲学术语“转译”理学家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做到了叙述思路的简洁清晰，提出“理”“性”“心”“知”四个维度来把握理学家的思想异同，和理学家所面临的四个基本问题，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足够自圆其说、逻辑严密。其三，则是作者在合乎情理的推理过程后，给出了自己对“朱陆异同”“朱王异同”问题明晰的总结。

不足方面，第一作者对于思想史的历史背景部分的把握有明显的不足，无论是土地私有制催生了士人阶级，还是元明时期历史巨变的影响，作者的说法都十分可疑，不太能站得住脚，且更像是直接征引其他成文专著的观点，未经过深入的再分析；其二，陷入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窠臼，这不是指全文都是如此，而只是在开头，实际上作者提到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其“唯物史观”、“辩证史观”都不是马克思著作中所表示的内涵，既“挂羊头卖狗肉”，又诉诸了不当权威，大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最后，这与前面提到的部分优点互为表里，正是因为作者采用了某些“取巧”的技术，可能使得对思想家的本意未能完全的理解而有偏差之处，但这也算是难免的代价。

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各有意见。就代表性而又具有一定道理的看法来说，钱穆以为，从朱熹到王阳明是一个儒学鞭擗向里逐步深入的过程；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则认为，宋明阶段理学的学术主流是“尊德性”，而到了清朝乾嘉考据学派兴起，又转变为“道问学”为主。还有的学者视程朱一派偏重于“道问学”，而陆王一派为重“尊德性”。毕游以为，无论是用“尊德性”来专指宋明理学或者是陆王一派都不甚妥当，朱熹和陆九渊乃至王阳明同样重视“尊德性”与“道问学”，至少在宋明理学家这里，两者不可分开来谈论。这一点也可以在《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中得到印证，经学怀疑思潮所导致的考据工夫及一系列新的学术动态，不仅是朝着“道问学”方向的努力，而且也是后来清代考据的先驱（先驱的说法还存疑，因为我们并不能仅仅根据两件事情的相似性就贸然判断其间的因果性。目前我们只能说宋学的这种从怀疑的角度对古经的考辨分析，与清学的考据工夫有相近之处，先驱与否，还要看是否有明确的传承关系。特别是由于宋学常常在后人眼中，被理学给全代表了，这确实是造成误解的一大因素），而这一怀疑思潮是宋代学者“重建秩序”要求的自然发展。其次，程朱理学中宇宙论被放在了一极重要的地位，也说明这一时期“道问学”与“尊德性”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只用“尊德性”来形容宋明理学的精神虽然有极大的偏差，但是我们仍可以说，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仍是这一时期儒学的最重要特征，“道问学”的功夫无疑最终也是为了“尊德性”服务，用西方哲学史的观念来譬喻，“宇宙论”的效用如同经院哲学家们为信仰寻找理性的支撑相类似。虽然原因及经过并不相同，但理学家们确然是走进了与经院哲学家们相近的陷阱之中，朱熹和王阳明都没有超越这一局限，只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取向，有着不同的流弊。

朱陆差异和朱王差异，我们相信作者对此的讨论基本上是合理的。作者的观点也与钱穆的接近，宾四认为与其说王阳明是继承陆九渊而起，毋宁说王阳明是以反对朱熹立论，刚好有部分观点与陆九渊相近。同时，作者也指出，不少地方则表现为朱陆的观点一致，而王阳明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作者将从朱陆对峙到王阳明心学的发展，看作是不断探索道德知识如何指导实践的路径，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删繁就简、贴近民间，消除了朱学宇宙论所带来的客观世界的“理”与主观之“理”的矛盾。这基本上是从余英时所说的“内在理路”的角度来说的，如果再看到程朱理学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其流弊至王阳明之时已极为严重，阳明心学的提出也是对此的回应，只不过也是矫枉过正，未能真正拔除病根。

我觉得本篇论文算是截至目前所看来说，对理学问题的研究中完成度较好的一篇。就本文未深入分析的部分，也留下了值得探讨的疑难：明清统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理学的地位的，是否只是将其作为工具来使用，而倘若如此，那么这又是只属于明清的特征，还是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古代史中普遍的现象？这一问题背后所指，也是研究宋明理学社会影响的极为关键所在。